

# 中国妇女解放之路

## ——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就

章舜粤

[摘要]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始终坚持妇女解放的伟大目标,领导中国妇女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妇女解放之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也在这一历程中不断丰富、发展。在新形势下,面对我们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必须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把妇女解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融合起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推进妇女解放事业。

[关键词]妇女解放;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17)04-0075-08

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它就成为中国人研究和解决妇女问题的重要思想武器。习近平指出:“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始终坚持把实现妇女解放和发展、实现男女平等写在自己奋斗的旗帜上,始终把广大妇女作为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始终把妇女工作放在重要位置,领导我国妇女运动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sup>[1]</sup>当前,面对未来、面对挑战,有必要回顾党领导的中国妇女解放事业,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更加充分地发挥我国广大妇女的智慧和力量。

### 一、性别与阶级的交融

在两千多年的封建宗法社会里,中国广大妇女尤其是劳动妇女深受剥削、压迫和欺凌。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华侵略脚步的加紧,在中国妇女被进一步压迫、剥削的同时,妇女解放问题的重要性也为一些先进知识分子所认识。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使对中国妇女解放道路的探索发生了重大转折。

早在1907年12月30日,中国早期无政

作者:章舜粤,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府主义者何殷震、刘师培等人在日本东京创办的《天义》里就刊登了《共产党宣言》中关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家庭问题的一节,作为《经济革命与女子革命》一文的附录。<sup>[2]</sup>(pp.204-205)《天义》又于1908年1月15日刊登了《〈共产党宣言〉序言》,1908年3月刊登《〈共产党宣言〉序》和《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全文,并以《女子问题研究:第一篇 因格尔斯学说》为题,发表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第二章里资产阶级婚姻家庭部分的摘译。<sup>[2]</sup>(pp.264-270,419-430,497-499)何殷震等人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解决中国妇女解放问题,指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是私有制;强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妇女受压迫最深,“资本家之罪,可谓上通于天者矣!”<sup>[2]</sup>(pp.197-198,113-114)当然,由于他们的无政府主义立场,尽管他们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来解决中国妇女问题,却找不到正确的妇女解放之路。

十月革命后,以李大钊、陈独秀、李达和向警予等为代表的一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代替资产阶级人权平等学说以分析和认识妇女解放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更直接领导了劳动妇女的解放运动,并在二大、三大和四大分别通过了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回答了关于妇女受压迫的根本原因、妇女解放的根本途

径、妇女解放运动与一般妇女运动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

第一,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是私有制,妇女的解放离不开社会主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从唯物史观出发,认为妇女受压迫地位的形成是其经济状况所决定的。例如李大钊就指出经济问题是社会的核心问题,“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庭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sup>[3](p.55)</sup>陈独秀亦指出,妇女受压迫的原因归根结底是财产私有制,“因为照现在的经济制度,妇人地位,一面脱离了家庭的奴隶,一面便得去做定东家的奴隶”。<sup>[4](p.47)</sup>因此,中共二大《关于妇女运动决议案》开宗明义地指出资本主义“平等自由”的妇女解放学说的虚伪性,“在他的制度之下,经济既不平,妇女是得不到一切平等和自由的。他们不但成为资本家用以操纵劳动市价更廉贱的生产奴隶,并且负担资本主义社会组织中家庭的和母性的负担。所以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之下,妇女是得不到解放的”,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实现妇女的解放。<sup>[5](p.160)</sup>这就将妇女解放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结合了起来,“妇女解放与劳动解放是天造地设的伴侣”,“只有劳动解放了,妇女才得真正的解放”。<sup>[6]</sup>

第二,妇女整体受压迫,而内部也有阶级之分,工农妇女是妇女解放运动的骨干。与晚清以来一脉相承的女权主义者不同,马克思主义者在认知到妇女整体受到社会制度的压迫的前提下,特别强调妇女内部的阶级分野。李大钊在评价旨在争取男女平权(主要是参政权)的“女权运动”时点出了“性别中的阶级”问题,认为“女权运动”所追求的“都是与中产阶级的妇人最有直接紧要关系的问题,与那些靡有财产、没受教育的劳动阶级的妇人全不相干。那中产阶级的妇人们是想在绅士阀的社会内部有和男子同等的权力”。即资产阶级女权运动与挣扎在生存线上的无产阶级妇女的诉求并不完全一致,“无产阶级的妇人们天高地阔,只有一身,他们除要求改善生活以外,别无希望”。因此,即便在妇女内部,也因为阶级利

益的不同而存在着阶级斗争,“一个是想管治他人,一个是想把自己的生活由穷苦中释放出来,两种阶级的利害,根本不同;两种阶级的要求,全然相异”。“中产阶级妇人的利害,不能说是妇人全体的利害;中产阶级妇人的权力伸张,不能说是妇人全体的解放”,而必须抱以阶级观点去分析妇女解放的问题。<sup>[7](pp.414-415)</sup>中共二大《关于妇女运动决议案》在指出认为所有的妇女均受严重压迫的基础上,将中国的劳动妇女分为“无产阶级妇女”和“半无产阶级妇女”,“在中国现状之下,不独女劳动者已陷在极残酷的地位,还有许多半无产阶级的妇女,也渐渐要被经济的压迫驱到工厂劳动队里面去”。<sup>[5](pp.160-161)</sup>中共四大《对于妇女运动之议决案》指出,现代妇女由于“私有财产制度的罪恶”沦为被奴隶的地位,全部妇女“包含在整个的被压迫民族之中,时受帝国主义和其工具——军阀的宰割”,而妇女内部也有半封建半资产阶级的上层妇女,买办阶级的妇女,小资产阶级的妇女和劳动妇女的区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工农妇女是妇女运动的“骨干”,要“在妇女运动中切实代表工农妇女的利益,并在宣传上抬高工农妇女的地位,使工农妇女渐渐得为妇女运动中的主要成分”。<sup>[8](p.250)</sup>

第三,妇女解放需要联合与团结各种力量。如上所述,中国共产党意识到了资产阶级女权运动与无产阶级妇女解放运动的根本不同,不同阶级的妇女实际上拥有不同的阶级利益。但正如李大钊所指出的,虽然“女权运动和劳动运动纯是两事”,但仍然需要“合妇人全体的力量,去打破那男子专断的社会制度”。<sup>[7](p.415)</sup>对此,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联合”的思想。首先,要建立“各阶级妇女及各妇女团体间的联合战线”,<sup>[9](p.320)</sup>同时对资产阶级女权运动加以指导、促其觉醒,“使之日趋于革命化”。<sup>[8](p.251)</sup>其次,要建立性别间的阶级联合,即全体无产阶级、劳动阶级,不分男女,联合起来作斗争。陈独秀说:“这不单是女子的事,而男子也是这样。所以希望男女要全部努力于社会主义。男女实行联合弱者以抗强者。”<sup>[4](p.147)</sup>中共中央在三大《妇女运动决议案》中指出,“不仅要

号召男女工亲密团结,而且要扫荡男工轻侮女工之习惯与成见”,<sup>[5](p.266)</sup>并在四大上再度申明“男女界限的争执”不仅“无谓”,而且对妇女运动、民族运动和劳动运动的结合是有害的。<sup>[8](pp.252-253)</sup>最后,要建立国际间的妇女联合、阶级联合。早在1919年2月,李大钊就强调:“一方面还要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包括男女)专断的制度”,这无疑“于阶级战争添一份力量”。<sup>[7](p.415)</sup>中国共产党也先后成立妇女部和妇女运动委员会,同时受共产国际执委会妇女书记的指导。<sup>[10](pp.33-34)</sup>

## 二、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进一步解放中国妇女

大革命失败以后,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而党的妇女运动方针、政策和实践也随之发生变化,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进一步解放了中国广大的劳动妇女。

早在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了束缚中国妇女的“四大绳索”理论,指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而这其中,“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地主政权既被打翻,族权、神权、夫权便一概跟着动摇起来”,因此妇女要求得解放,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政治斗争,彻底推翻地主权力,并开始经济斗争,“期于根本解决贫农的土地及其他经济问题”。<sup>[11](pp.31-33)</sup>毛泽东将广大妇女的解放与整个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联系起来。

在土地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秉承只有阶级解放才有妇女解放的正确观点,将妇女解放运动纳入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中。党从解决妇女的切身利益出发,充分保障广大妇女的各种权益,最大限度地发动妇女群众参加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事业中来。

第一,保障了妇女的经济权利。1920年,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井冈山土地法》中明确

规定,土地分配“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sup>[12](p.814)</sup>妇女们获得了平等分得土地的权利。1930年11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劳动妇女斗争的纲领》,强调了劳动妇女的劳动保护、男女同工同酬,并再次指出“农妇与男子平等的有分配土地之权”。<sup>[13](p.496)</sup>1931年11月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规定,“雇农,苦力,劳动农民,均不分男女同样有分配土地的权限”。<sup>[14](p.730)</sup>同时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专辟一章,保障女工的各项劳动权益。<sup>[14](pp.708-709)</sup>

第二,保障了妇女的政治权利。1931年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一次真正赋予了妇女以男女平等的政治权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的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种族,宗教,在苏维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皆为苏维埃共和国的公民。”<sup>[14](p.650)</sup>在苏区,妇女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得到了充分的保障。例如1934年在苏区举行的选举中,“妇女代表占代表总数的百分比,如兴国为30%以上,乡苏主席有20余个女子。杨殷为25%。上杭才溪区的上才溪乡则为54.6%,下才溪乡则为64.8%。各地乡代表的妇女一般地在25%以上。”<sup>[15]</sup>

第三,保障了妇女的婚姻自由。中国妇女长期以来受到封建家庭的压迫,没有婚姻自由。中国共产党坚决支持妇女摆脱封建婚姻的束缚,获得婚姻自由。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颁布。1934年4月,在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修订后,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切实保障了妇女的婚姻自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第一章明确提出:“确定男女婚姻以自由为原则,废除一切包办强迫和买卖的婚姻制度。禁止童养媳。实行一夫一妻,禁止一夫多妻与一妻多夫”,并明确“确定离婚自由,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即可离婚”。<sup>[16](pp.373-374)</sup>婚姻自由的确立,使得广大妇女从封建家庭、封建婚姻的痛苦中解放出来,极大地调动了广大青年男女参加革命的积极性。

此外，苏维埃政权还实行了文化教育改革，建立了各种夜校、半日学校、识字班、临时训练班等。毛泽东指出：“妇女从文盲中得到了初步的解放，因此，妇女的活动十分积极起来。妇女不但自己受教育，而且在主持教育”，妇女的受教育权得到了充分保障。<sup>[17](p.330)</sup>苏区还成立了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并建立了女工农妇代表会议制度，对保障妇女权益做了制度上的保证。<sup>[18](pp.87-88)</sup>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脚步的加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亦融入了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之中。抗战期间，广大中国妇女为民族解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同时也在这一过程中进一步获得自身的解放。正如邓颖超所说：“中国妇女只有在积极参加抗战中，求得国家民族的解放胜利，然后妇女的胜利才能获得。”<sup>[19](p.1)</sup>1937年9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妇女工作大纲》，指出党的妇女工作的基本任务为“动员妇女力量参加抗战，争取抗战胜利”，提出“以统一战线的策略去发动和组织各阶层的妇女”，以达到“从争取抗战民主自由中争取男女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平等，改善与提高妇女地位，反对一切封建束缚与压迫”的总目标。<sup>[20](pp.1-3)</sup>1939年2月，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开展妇女运动的决定》，强调绝不能忽视妇女工作的作用，要求奖励健全各级党的委员会下的妇女部和妇女运动委员会，为党开展妇女工作进一步打下组织上的基础。<sup>[20](p.136)</sup>一个月后，中共中央又下发《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关于目前妇女运动的方针和任务的指示信》，强调“动员与组织更广大的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各方面的工作”。<sup>[20](pp.144-145)</sup>

抗战期间，党中央还坚持以劳动妇女为主体，发挥妇女在抗战上的重要作用。1940年2月8日，毛泽东向中央妇委写信指出，“妇女的伟大作用第一在经济方面，没有她们，生产就不能进行”，提出要“提高妇女在经济、生产上的作用”。<sup>[20](p.261)</sup>1943年2月24日，中央做出《中共中央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要求党员干部深入农村，“组织妇女生产，解决其生产困难，增加其经济利

益”。<sup>[21](p.128)</sup>自此，边区妇女的生产运动普遍开展，大量妇女参加到大生产的热潮中，为抗战做出了突出贡献。

抗战胜利后，1946年3月8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中国妇女今后的任务》的社论，指出“完成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大业，如果没有占全国人民半数的女同胞的动员和组织是不可能的。同时妇女同胞的命运和全中国的命运是分不开的，妇女同胞要完成自身的解放，也就必须首先更积极地动员与组织起来，为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而斗争”。<sup>[22](p.27)</sup>中国妇女的解放事业再次与人民解放事业紧密联系起来。1947年3月8日，《解放日报》社论更将解放区妇女的任务具体化为“参战、土地改革和生产运动”。<sup>[23]</sup>

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继承了土地革命时期男女平等的精神，充分保障了妇女的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著名的《五四指示》，即《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将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变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土地政策。而基于男女平等的阶级政策，广大农村妇女也因此获得了土地。1947年10月10日，《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规定土地的分配“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sup>[24](p.417)</sup>12月9日，邓颖超发表《土地改革与妇女工作的新任务》，以鲜明的阶级斗争观点，重申“农村劳动妇女与其他农民同受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具有共同的要求，共同的利害”。因此在土改过程中必须特别注意：“使妇女工作与土地改革结合；妇女运动与农民运动结合。”<sup>[22](p.213)</sup>广大劳动妇女在积极参加土改的同时，广泛地、积极地、主动地参加劳动、战斗和支前工作；同时党也继续加强了对妇女经济、政治、婚姻、教育等权益的保障，进一步促进妇女在生产和斗争中解放自己。<sup>[25](pp.117-119)</sup>由此，在包括广大中国妇女的中国人民共同奋斗下，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国的妇女解放事业从此进入了崭新的阶段。

### 三、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推进 妇女解放事业

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妇女翻身得解放,我国的妇女解放事业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事业具有如下特色。

第一,把妇女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紧密结合起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与民族的、阶级的解放运动紧密结合起来。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转移,妇女解放运动亦围绕党的新中心任务来开展工作。1949年三四月,召开了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通过了《中国妇女运动当前任务的决议》。该“决议”指出,“妇女工作,要在不忽视乡村妇女工作的条件下,以城市妇女运动为工作的重心”。<sup>[26](p.240)</sup>正如邓颖超所说,“执行全国人民共同的中心任务,也就是执行妇女解放运动的总任务”。<sup>[19](p.237)</sup>因此,这一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开展均紧密围绕党和国家在各个阶段的中心任务。

第二,时刻不忘维护妇女的各项切身利益,注重解决妇女的特殊困难。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将组织妇女参加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与维护妇女切身利益结合起来,巩固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所取得的革命成果,进一步促进妇女的解放。邓颖超指出,在发动妇女群众执行和完成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时,“必须特别注意帮助和照顾妇女。要从妇女生活的实际情况出发,照顾妇女的特殊困难”。<sup>[19](p.238)</sup>在这一指导思想下,我国建立健全法律制度,确立男女平等原则,切实维护妇女的政治权利;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保障婚姻自由,消除封建婚姻制度对妇女的束缚;开办了大量的幼儿园、托儿所,减轻了妇女参加劳动的家庭负担;发动和鼓励妇女参加各项生产劳动,在劳动中解放自己;普遍开展妇女群众中的教育学习运动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妇女解放事业取得了新的进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也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第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辟妇女解放运动发展的重要途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要求当前妇女解放运动必须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从社会发展中推进妇女解放。邓小平指出妇联工作中“政治工作是要做的,而且是要好好地做,但是政治工作要落实到经济工作上”,从经济发展来促进妇女的解放。<sup>[27](p.195)</sup>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妇女积极投身经济建设,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我国妇女只有大规模地参加经济建设,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妇女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社会和家庭地位才会进一步提高,真正获得与男子同等的权利和地位,进一步实现自身的解放。”<sup>[28]</sup>

第二,注重对外开放,融入世界妇女运动潮流。改革开放以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人们更深入地了解、借鉴国外各类妇女思想理论及妇女运动的经验,进一步融入世界妇女运动潮流,积极参与和支持全球妇女事业。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长期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视为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对立物。改革开放以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不脱离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我国妇女运动逐渐开始吸收、借鉴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中的合理成分。与此同时,我国的妇女运动也顺应国际潮流,“主动积极地把自身所领导的妇女运动实践纳入国际社会性别主流化洪流之中,在国际妇女运动的大潮中广泛地汲取营养、接受监督、获得检验”。<sup>[29]</sup>

第三,确立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促进妇女地位的提高。1995年9月4日,江泽民在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欢迎仪式上发表重要讲话,阐明了我国在妇女解放问题上的一系列主张,并郑重宣布:“我们十分重视妇女的发展与进步,把男女平等作为促进我国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sup>[30](p.19)</sup>将男女平等确立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使得其具有权威强制性、普遍约束性和长期稳定性,<sup>[31]</sup>使其在整个政策体系

中处于最高层次,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关于如何实现男女平等的思想,进一步推动了相关保障机制的建立与健全。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妇女解放事业取得了新成就、新进展。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而这离不开充分发挥我国妇女的伟大作用。习近平指出,“做好党的妇女工作,关系到团结凝聚占我国人口半数的广大妇女,关系到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强大力量,关系到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sup>[1]</sup>习近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新形势下的妇女和妇女工作问题做了深刻的阐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

第一,明确当代中国妇女运动的时代主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习近平指出:“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目标任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也是当代中国妇女运动的时代主题。”<sup>[2]</sup>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是我国妇女的神圣使命,离不开广大妇女充分贡献智慧和力量。

第二,强调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妇女解放,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从中国妇女的实际情况出发,把握时代脉搏,走中国道路。正如习近平所说,“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历程同促进男女平等发展的历程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使我国妇女事业发展具有更丰富的时代内涵,使我国亿万妇女肩负起更重要的责任担当。”<sup>[3]</sup>要将中国妇女发展的命运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紧密结合起来。

第三,从三个层次对男女平等做了新的阐述。习近平指出,实现男女平等必须做到“实现妇女平等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平等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平等享有改革发展成果”。<sup>[4]</sup>要进一步加强完善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确保妇女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广泛而深入地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方方面面。要保证妇女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机会平等,使广大

妇女在社会劳动中实现自我价值,争取妇女解放。要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坚持共同富裕的根本原则,为实现事实上的男女平等而奋斗。

第四,注重发挥妇女在新形势下加强家庭文明建设的重要作用。习近平多次强调要“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而妇女是家庭的重要成员。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妇女在和睦幸福家庭的建立,良好家教、家风的形成中起着重要作用。习近平指出,“要注重发挥妇女在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德、树立良好家风方面的独特作用”,“广大妇女要自觉肩负起尊老爱幼、教育子女的责任,在家庭美德建设中发挥作用,帮助孩子形成美好心灵,促使他们健康成长,长大后成为对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人。妇女要发扬中华民族吃苦耐劳、自强不息的优良传统,追求积极向上、文明高尚的生活,促进形成良好社会风尚。”<sup>[5]</sup>

## 四、余 论

回顾近百年来中国妇女解放的历程,我们发现中国妇女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妇女解放之路。从纵向看,比起传统社会深受“四大绳索”束缚、压迫的中国妇女,经过百余年的奋斗,其政治地位明显提高,获得了独立的经济地位,享受平等的受教育权,在婚姻和家庭的地位中也有显著提高。总体而言,中国妇女地位已发生了巨大变化。

从横向看,相比其他一些国家,中国妇女的中国社会地位比较高。例如同为东方的人口大国,印度在种姓制度和各种宗教的影响下,妇女地位不高。据统计,印度记录在案的强奸案件由1971年的2487起增至2011年的24206起,增长率为873.3%,平均每3分钟就会发生一起针对女性的暴力犯罪,每22分钟就发生一起强奸案。<sup>[6]</sup>尽管印度实行西式民主制度,也制定了各种保证男女平等的法律,但“仍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妇女的地位”,“基本上是一个父权社会”。<sup>[7]</sup>我们的近邻日本和韩国,

深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尽管近年来妇女地位有所提高,但仍然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极不相称。日本在妇女就业、男女同工同酬等方面还与中国有不小差距。<sup>[34]</sup>韩国妇女参加经济活动的比例不到50%,薪酬也仅为男性的六成左右,妇女在家庭中主要扮演传统角色,“夫权制的思想观念在韩国社会是根深蒂固的”。<sup>[35]</sup>在中东和其他一些受伊斯兰教传统影响的地方,妇女地位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尽管伊斯兰教法于信仰、财产继承等方面给予了穆斯林妇女一定的自由和权利,但同时也规定了“男人的权利比她们高一级”,男子对妇女拥有绝对的权威,在婚姻和家庭等许多方面地位极不平等。<sup>[36]</sup>即便是号称最发达的美国,妇女地位也远没有达到男女平等的程度,仍然面临着女性社会地位下降,性别收入差距明显,职场歧视,各种不同形式的性骚扰和性侵犯频发等一系列问题。<sup>[37]</sup>

无论是从纵向还是横向,都可以看出,我国妇女解放事业所取得的成就和进步。这是因为,我国的妇女解放事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之下,正确认识了妇女受压迫的根本原因。“几世纪以来,平等自由的原则,成为资本主义‘文明’国装饰门面的口头禅”,<sup>[5](p.160)</sup>尽管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运动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妇女始终受到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因此,我国妇女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将妇女解放与中国人民的解放融合在一起,广大妇女参加了轰轰烈烈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但必须清楚地看到,目前我国妇女发展的状况还存在着很多问题,一些社会丑恶现象死灰复燃,一些压迫、剥削妇女的机制也悄然出现。例如,有些人鼓吹妇女“回家”,主要从事家务劳动,回归“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秩序;或者以就业压力大为借口,主张妇女“阶段性就业”;有人将“三从四德”甚至缠足裹脚等封建糟粕搬出来,包装成优秀传统文化,大办所谓的“女德班”,灌输腐朽落后的旧道德、旧习俗;有人鼓吹“学得好、干得好,不如嫁得好”,提倡通过婚姻改善物质条件、实现阶层跃

升;有人在思想上看不起劳动妇女,或者否认“妇女能顶半边天”;在一些地方还发生了宗教极端思想向妇女渗透的危险情况。此外,据第三期中国社会妇女地位调查,我国还面临着“中西部农村妇女的教育和健康状况有待改善”,“女性劳动收入相对较低,两性劳动收入差距较大”,“农村妇女失地和土地收益问题突出”,“妇女参与决策和管理仍面临障碍”,“女性家务劳动负担较重,平衡工作和家庭需要社会支持”,就业歧视、性骚扰、家庭暴力等“性别歧视现象仍一定程度存在,妇女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亟待改善”等一系列问题。<sup>[38]</sup>

回顾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所取得的进步和成就,面对仍然存在的问题,我们要牢记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说的,“不忘初心、继续前进”。<sup>[39]</sup>中国的妇女解放事业曾经与中华民族反帝反封建的事业融为一体,事实上也就是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融为一体。“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妇女的实际情况,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解放之路;不忘追求共产主义、追求包括妇女在内的人类解放的远大理想。在新形势下,我们仍要坚持妇女解放的根本路径是社会主义;坚持参加社会劳动是妇女解放的一个先决条件;发挥妇女的伟大力量参与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巩固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时期以来取得的各项成就,坚决保障妇女的政治、经济、受教育等各项权益,与各种压迫、歧视妇女的社会丑恶现象做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妇女的真正解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发挥我国妇女伟大作用[J].妇女研究论丛,2014,(1).
- [2]万仕国,刘禾校注.天义·衡报[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 [3]李大钊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4]陈独秀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6]向警予.女子解放与改造的商榷[J].少年中国,1920,(2).
- [7]李大钊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3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10]耿化敏.中国共产党妇女工作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 [11]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5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13]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三〇)(第6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8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15]梁柏台.今年选举的初步总结[N].红色中华,1934-01-11.
- [16]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7—1937)[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
- [17]江西省档案馆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M].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 [18]江西省妇女联合会,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苏区妇女运动史料选编[M].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
- [19]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蔡畅、邓颖超、康克清妇女解放问题文选(1938—1987)[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 [20]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
- [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20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22]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45—1949)[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
- [23]迎“三八”妇女节[N].解放日报,1947-03-08.
- [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24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25]全华,康沛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发展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 [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2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27]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28]陈慕华.在经济建设主战场发挥妇女的“半边天”作用[N].人民日报,1992-03-08.
- [29]崔兰平.邓小平对新时期中国妇女运动的历史性贡献[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
- [30]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95北京非政府组织妇女论坛丛书编委会编.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重要文献汇编[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8.
- [31]赵玉兰.关于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几个基本观点[J].妇女研究论丛,2002,(5).
- [32]杨兴培.印度强奸案缘何持续发酵[N].法制日报,2013-01-08.
- [33]王江雨.印度妇女地位背后的无奈[J].南风窗,2015,(12).
- [34]金育强,刘颖等.中日两国妇女的社会地位、闲暇时间与体育生活的社会学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2,(2).
- [35]任明,王艳秀.韩国妇女社会地位问题探析[J].人口学刊,2004,(4).
- [36]王怀德.伊斯兰教与妇女[J].宁夏社会科学,1991,(3).
- [3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6年美国的人权纪录[N].人民日报,2017-03-10.
- [38]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课题组.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报告[J].妇女研究论丛,2011,(6).
- [39]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7-02.

责任编辑:美 景



between the October Revolution and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xism–Leninism as well as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Chinese achieved the victory of new–democratic revolution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accomplished enormously in socialist construction and the undertaking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Taking the Russian path” refers to taking the pathway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 The CPC takes their own undertaking as the succession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 while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its 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Zhou Xin–cheng)

**In Retrospect to the CPC’s Commemorative Activities for the October Revolution of 1917:** Domestic academia witnesses insufficient studies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 of 1917, although the CPC highlights the incident with various commemorative activities to realize their unique social functions. The October Revolution exerted a profound impact on crisis–stricken Chinese nation. Thus, the studies on the CPC’s commemoration of the revolution could deepen our knowledge of the origin, development, chief forms, social functions, and profound influence of the CPC’s commemoration, from which we also learn valuable lessons in terms of Chinese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Zhang Yuan–xin and Wu Su–xia)

**From “Diversity–Orderly Structure” to “Equity Pattern”:** analyse the historical trend of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since modern China: “Diversity–orderly structure” as a social institution in ancient China characterized its social fabric, national structure, governance mechanism, and cultural morphemes. Since the modern times,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has followed the trend of from “diversity–orderly structure” to “equity pattern”. “Equity pattern” is a rudimentary mechanism for modern society. And its modern social structure calls for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bility in China. (Zhu Xin–shan)

**On the Pathway Towards the Liberalization of Chinese Women: The CPC’s Great Achievements of Promoting the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of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or reform, the CPC persistently stick to the great goal of woman liberalization and led Chinese women to explore a unique pathway towards woman liberal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which the localized Marxist woman theories theory has been continually enriched and improving. In the face of achievements and existing problems, we shall adhere to our primal conviction and keep making progress in the new age. We shall also integrate the liberalization of woman with the revitalization of the nation, and continue the undertaking of the former along the socialist pathwa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Zhang Shun–yue)

**On Alienated Consumption: Its Generative Logic and Deconstructive Pathway:** The popularity of alienated consumption suggests its awareness of the age and social factors involved. Its generative logic begins with the alienation of labor, develops with that of demand, and leads to that of consumption. The current society increasingly relies on commodity and purchase for expression, which accounts for the emptiness of life and anxiety of survival. Thus, its deconstructive pathway shall start with eliminating the alienation of labor. Amid socialist public ownership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s a fundamental economic institution, two deconstructive solutions are worthy of exploring, namely, “the more doesn’t stand for the better” and “human’s satisfaction stems from production rather than consumption”. (Ning Yue)

**On the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 among the Mass in Belgium: Its Practice and Experience:** The bodies for Marxism popularization in Belgium, such as the institute of Marxist studies and the Belgian Labor Party, always uphold the integration between Marxism and the proletariat. They publicize Marxism in various ways, make dramatic achievements in terms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promoting entities, the expansion of the mass and ideological behavior, and accordingly facilitate the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 in Belgium. It is advisable for us to learn from their successful practice and experience in terms of entity training, dissemination measures, and etc. so as to further popularize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Yang Quan–hai and Ding Wei)

**On Marxist Conviction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in the Initial Period of the PRC: It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Illuminative Experience:** The CPC has long attached significance to political conviction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The intensification of Marxist conviction edu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 the initial period of the PRC not only served as an inevitable alternative for dealing with the dramatic social changes, but met the objective requirements of fulfilling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satisfied the urging need for cultivating the constructors and successors for the Republic.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new China, the CPC chiefly focused on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teacher training, curriculum standardization, method expansion. Its development is magnificent, while the experience and practice could provide significant illumination for the current work. Hence, Marxist conviction edu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 the new age shall keep a balanced relationship between “breaking the old” and “establishing the new”, “tradition” and “temporariness”, “theoretical infusion” and “social practice”, as well as “unification” and “enrichment”. (Chen Yun–yun)

**The Cultural Mission for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xist Historiography:** The proposal of cultural confidence has greatly inspired and encouraged the scholars of philosophical and social sciences, especially numerous historians. Chinese Marxist historiography as a cornerstone has provided significant spiritual resources for cultural confidence. Cultural confidence entails that Chinese Marxist historiography critically inherits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that it summarizes and elevates Chinese revolutionary culture and advanced socialist culture. The philosophy of integral thinking is its powerful weapon to overcome historical nihilism. The deprivation of humanistic spirit and humanistic concern in contemporary China is a barrier to be conquer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 We shall stick to the dominance of Chinese Marxism historiography, intensify the researches on Marxist theories of human beings, and provide intellectual support for the ultimate liberalization of human beings. (Guo Chao)

(翻译:张剑锋)